

知情、回避与服从：1958-1960 年的无为政治

——以县委会记录为中心

曹树基

内容摘要：本文根据档案资料，揭示出无为县委在面对粮食短缺、断粮、人口死亡等事件时的政治取向和政治行为。可以确认，无为县委对于全县的粮食产量、分配，以及人口死亡，是知情的。然而，不仅无为县委的领导们回避死亡，省委领导也回避死亡。在危机面前，无为县委只能也必须不折不扣地“贯彻”与“落实”芜湖地委与安徽省委的指示精神。下级政权成为上级政权之派出机构。知情、回避与服从便成为大饥荒时期县级政治特征的最好概括。

关键词：无为县 大饥荒 政治

一、引言

1959-1961 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合计约 3250 万，而安徽一省非正常死亡人口就有 633 万，非正常死亡人口占灾前人口总数的 18.4%，位居全国之首¹。据新修《无为县志》，从 1958 年到 1960 年，无为县人口净减少了约 25 万。排除外迁人口并考虑 1959 年超过正常死亡人口的出生人口，无为县的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 24.5 万，占灾前全县总人口的 25.8%。²

一个近百万人口的大县发生了人口多达数十万的大死亡，作为本地最高领导层的中共无为县委员会究竟是如何措置的，就成为一个问题。本文利用无为县档案馆所藏县委会纪录，展开无为县人口非正常死亡问题的相关探讨。本文意在通过这一分析，把握基层政治的实际运作。危机时代的县级政治，本身就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政治学命题。

在进入正文之前，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用于分析的无为县“县委会纪录”所涉县委会议，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层次：县委书记处书记会议、县委常委会议、县委委员会议、县委扩大会议（通常扩大至公社书记或县政府各部部长——后改为局长）、县委书记与各部长会议、公社书记会议（可分第一书记会议、第二书记会议）、三级干部（县、区、公社）、四级干部（+大队）或五级干部（+小队）会议等。此外，还包括一些没有正式名称的“会议”，

¹曹树基：《1959-1961 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原因》，《中国人口科学》，2005 年第 1 期。

²无为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无为县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 年版，第 110 页。无为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的计算方法参见本文注 1 所引文。

可以理解为县委会的主要领导人与其下属之间商议某件事情的碰头会。我相信在这些有正式记录的会议之外，还存在大量的非正式的协商与谋划。只不过，历史研究须依据文献记载来展开，没有记载的会议及事件，无法成为我们讨论的对象。

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因粮食短缺而引起。有关粮食问题的讨论，便成为这一时期县委会议讨论的主要议题。本文以粮食问题为主轴，广泛搜集档案中有关粮食的所有记载，厘清无为县粮食的产量、征购量、外调量，以及农民的口粮安排等，据此而理解中共无为县委成员在粮食问题上种种意见及依据。与以前各种研究相比，本文研究在县级层面上展开，有些时期，则可能深入到县以下的层级。本文不仅讨论全县范围的粮食供应，而且考察县以下粮食供给中的问题，讨论缺粮的准确时点及具体区域，并对相关原因进行分析。1958-1960 年无为政治的过程与特征，也就包含其中。

二、粮食产量、征购、外调与口粮

1、粮食产量：真实与虚假

在展开本节讨论之前，有必要讨论无为县历年粮食产量。本文讨论的重点主要放在 1958-1961 年间，因为，这几年的粮食产量与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密切相关。相关数据见表 1。

表 1 1953-1964 年无为县人口与粮食产量

年份	人口	面积（亩）	亩产（公 斤）	总产（斤）	粮食净调出（斤）
1953	944711	2006229	141	565474000	116870000
1954	937550	1835419	45	165772000	-286130000
1955	940004	2285019	209	953624000	166330000
1956	944884	2484361	92	457598000	-40730000
1957	982979	2248142	140	630000000	115980000
1958	950056	2215455	158	700000000	201950000
1959	820259	2021891	111	448304000	161000000
1960	662557	2043695	98	400000000	118740000
1961	686219	1898312	108	410000000	76420000
1962	762252	1668288	135	450000000	62190000
1963	804544	1818609	192	700000000	210330000
1964	780625	1730887	152	526956000	112720000

资料来源：无为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无为县志》，1993 年，第 106 页，第 130 页，第 279 页，第 286

页。

1954 年长江大水，无为被淹，县境内大部分地区粮食绝收。国家从境外调入 2.86 亿斤粮食，救济灾民。1955 年大丰收，与前一年的水灾有关。其他年份，暂不讨论。1958 年，全县粮食产量 7 亿斤，有编造之嫌。多年后安徽省副省长张凯帆回忆说：“（无为县）粮食局长找我反映，他们有两本账，一本收七亿斤，另一本十三亿斤，其实只七亿斤。”³这一说法也不可靠。《无为县志·大事记》“1963 年条”摘引《中共安徽省监委就姚奎甲在无为县任第一书记期间所犯错误的通知》，指出 1958 年全年粮食总产 6.2 亿斤。

从单产数据也可以证明这一点。1958 年 11 月 21 日上午，无为县委召开常委会，讨论粮食及相关问题。会议纪录中只有一个发言者，姓名不详，从语气推测，应当是县委第一书记姚奎甲。姚称：“群众讲的粮食产量也很难听，一问都是二、三百斤。”⁴表 1 记载是年粮食亩产 158 公斤，暨 316 斤。这说明 1993 年编修新县志时整理的粮食数据，仍有可能偏高。如果将 1958 年粮食总产定为 6.2 亿斤，则粮食亩产为 271 斤，与“群众讲的粮食产量”基本符合。

1958 年 11 月 28 日，无为县委开会“对粮食摸摸底”，确定产量。这天，姚奎甲在合肥，书记处第二书记吕奋志主持会议，他定下的基调是，“原来报的产量是 16 亿斤，第二次报 15 亿斤”⁵；吕还分别确定早稻、中稻、单晚和双晚面积及产量，与新修《无为县志》对照，除单晚外，面积与产量皆有夸大。⁶高估的粮食总产就是这样形成的。

在接下来的会议上，有两位区委书记或公社书记汇报本地的亩产与总产，以确定全县的粮食总产量。讨论的过程冗长乏味，不予转引。吕奋志归纳：“现在有两个意见：一个意见：单产 800 斤，总产 11.2 亿。另一个意见：单产 900 斤，总产 12.6 亿。究竟哪个切合实际，大家讨论。”讨论其实并没有进行，会议决定听取区里的意见，以便最后确定产量。

这天下午，各区的意见汇总起来了。各区报上来的数据与县委基本保持一致。不仅一致，而且取了较高的一个数据，即 12.4 亿。吕奋志说：“总产量 12.4 亿斤，大家同意。”又说：

³ 张凯帆：《张凯帆回忆录》，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347 页。

⁴ 《县委会议纪录》，1958 年 11 月 21 日，无为县档案馆：1-1-1-1958-096。

⁵ 《县委会议纪录》，1958 年 11 月 28 日，无为县档案馆：1-1-1-1958-096。

⁶ 无为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无为县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 年，第 132 页。

“大家思想一致，以后不能讲另外一个数字。”事实上，这个数据恰恰是实际产量的一倍。

2、粮食征购与外调

1958 年的粮食征购任务是按照当年粮食总产量确定的。在 1958 年 11 月 21 日的县委常委会议上，姚奎甲开口就是：“粮食征购，任务 4.08 亿斤，3.18 亿斤……31 个公社也没有一个全部完成。51 个社算完成，但还有 2 万斤种子在里头。267 个作业区 137（个）完成。”⁷征购任务进展缓慢。

无为县地域广大，实行的是县——区——公社三级体制。全县共有 31 个公社，由 1957 年 4 月以前的 95 个乡镇合并而来，原来的乡镇其实就是“小社”。在全部“小社”中，有 51 个算是完成了任务。2 万斤种子，播种时要还给生产队的。当时的说法叫征种子粮，是征过头粮的一种。“作业区”即后来的生产大队。

姚奎甲的讲话中，全县 4.08 亿斤的征购任务，远未完成。如果以超过半数的小社及作业区基本完成征购任务这一点看，3.18 亿斤应当是已经完成任务数。

征购粮包括两个部分，农业税（公粮）与统购粮。其中有多少是农业税，又有多少是“统购粮”，对于本文而言，并不重要的。相较之下，净调出无为的粮食数额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净调出的粮食不可能成为农民的口粮。

表 1 记载了无为县历年粮食调运数，正值为调出，负值为调入。1958 年净调出粮食 2.02 亿斤，1959 年净调出为 1.61 亿斤。从历年征购数据的排列来看，这一系列的数据应是可信的。例如，在 1957 年，总产 6.3 亿斤，调出 1.16 亿斤，余 5.14 亿斤。总人口 98.3 万，其中非农人口 10 万，以每月 500 万斤供应，每年需要 0.6 亿斤，余 4.54 亿斤为农村口粮、种子和饲料粮，人均 514 斤，折合成品粮 386 斤，扣除种子与饲料，大约每人日均 1 斤成品粮，达到国家规定的农民口粮标准，是够吃的。1958 年的情况因粮食外调过多而使情况变得复杂起来：年产 6.2 亿斤，外调 2.02 亿斤，剩 4.18 亿斤。较 1957 年几乎要少 1 亿斤。细账不用再算，农民的粮食肯定不够吃。

还是在 1958 年 11 月 21 日县委常委会议上，姚奎甲称：“去年 3 亿 6，纯交 1 亿斤，还有 57 年的 1 亿斤要交。今年任务 40800 万斤，其中有 31500 交出……今年种子留多些，口粮

⁷ 《县委会议纪录》，1958 年 11 月 21 日，无为县档案馆：1-1-1-1958-096。

定量 490 斤……对任务并不动摇。” 1957 年实际外调 1.16 亿斤，而 1957 年的外调任务是 2 亿斤，没有交的 0.85 亿斤最后被赖掉了。1958 年本身的 2 亿多斤外调任务加上 1957 年少交还要交的 0.85 亿斤，外调粮计划 3.15 亿斤。

姚奎甲又称：“无为完成征购任务 4 亿斤外，调省 2 亿 3 千万斤，内销壹亿四千万斤。”“我表态，回去做工作，下面有粮食，我们入库了 3 亿 8 千 5 万斤粮食，地委调我们 2 亿 3 千万斤，我们意见，调 2 亿斤，保证调，出问题我们负责……这个问题未定案，我临走时，曾书记还说：‘外调 2 亿 3 千万斤。’”

事实上，在讨论 1958 年的外调粮时，1957 年的未清陈账，已经不再被提起。姚奎甲保证外调 2 亿斤，与《无为县志》的记载吻合。而地委与省委要求的 3000 万斤，则是在讨价还价中脱掉了。姚清楚，县里只能拿出 2 亿斤，特大丰收的 1955 年，也只调出 1.66 亿斤。这一数据表明，姚本人并不相信全县产量有 12.4 亿斤。如果相信，哪怕再少一点，也不会 3000 万斤上面与省委讨价还价。姚的讲话还表明，在征购及外调粮食上，无为县委承受来自上级党委的巨大压力。

3、农民口粮

1958 年 11 月 27 日，在县委书记与县政府各部部长参加的会议上，吕奋志提及目前的工作重点是抓入库，因为，“全县目前入库只 3 亿 5 千万斤”。这一数据较之上引 11 月 21 日的 3.18 亿斤，有所增加。⁸

如果入库的粮食中没有种子的话，入库粮即为征购粮。新修《无为县志》第 279 页称 1958 年征购粮食为 3.4837 亿斤，此即吕奋志所称 3.5 亿斤之由来。也就是说，到 11 月底，全年的征购粮已经全部入库了。只是由于其中包括了种子，种子是要还给农民的，所以，事实上的征购粮食不及此数。

1958 年全年粮食总产 6.2 亿斤，扣除 3.5 亿斤征购粮后，余 2.7 亿斤。非农人口的粮食供应，从征购粮中支出。85 万农业人口均分余粮，人均可以分得 317.6 斤原粮，折合 238.2 斤成品粮，每人日均 0.65 斤。事实上，在政府征购的 3.5 亿斤粮食中，有 0.52 亿斤在 1959

⁸在 12 月 31 日（发表稿有误，现改正）的无为县委和正副部长会议上，姚奎甲说：“我们入库了 3 亿 8 千 5 万斤粮食。”较此多出 3000 万斤粮食。在 1961 年姚奎甲的交待材料中以及他人的揭发材料中，始知此数据为姚浮夸。

年春天返销给农民，其过程详见下文，则农民实有粮食 3.2 亿斤。85 万农业人口，人均 376 斤原粮，折合 282 斤成品粮，每人日均成品粮 0.77 斤。从后面的文件看，老百姓希望达到每人每天 12 两，即是这一标准（12/16=0.75）。不过，如果将饲料考虑其中，农民的实际口粮还要少一些。

无为县委能够控制的粮食有多少呢？3.5 亿斤征购粮中包括了相当数量的种子粮。在上级的压力下，农民将种子的一部分卖给国家。全县 200 万亩播种面积，以每亩 15 斤计，则需种子 0.3 亿斤。按照全县种子的一半交到县粮库计算，需返还农民种子 0.15 亿斤。1958 年全县外调粮食为 2.02 亿斤，除去这三部分粮食，无为县委手中控制的粮食只有 0.81 亿斤（3.5-0.52-0.15-2.02）。下文表明，城镇人口最高峰时，以每月 900 万斤计，年需 1.08 亿斤。以 500 万斤计，需要 0.6 亿斤，以后者为标准，政府手中仍有 2100 万斤的富余粮食。进一步说，即使全部的种子粮需要由政府返还，在一个比较低的农民口粮标准下，无为县的粮食也是收支平衡的。

也就是说，在 1958 年，无为县的粮食产量，在外调 2.02 亿斤粮食以后，还可以供应全县人民较低水平的生活。农民每人日均口粮可以达到略低于原粮 1 斤的水平。这一标准是不会造成规模性的人口死亡。当然，这一假设的前提是全年均衡供应，各区域均衡供应。

三、饥荒初现：1958 年底至 1959 年初

就无为县而言，在农民口粮指标如此低的情况下，要做到全年均衡与各区域均衡供应，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至 1958 年年底，饥荒初现。

1、饥荒初现

1958 年 12 月 31 日县委和各部正付部长会议，是无为县大饥荒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会议。姚奎甲的态度相当悲观。他说：“最近粮食无声无气，不仅如此，下面还要粮食。”揣摩其意，应该是指粮食入库工作没有进展，而下面伸手要粮却越来越凶。姚传达省委书记曾希圣的七点指示，其中有两点要特别加以讨论：其一，粮食调剂，其二，挖“社会原（存）粮”。

⁹这两点成为 1959 年初反瞒产运动的出发点。

⁹《县委会议记录》，1958 年 12 月 31 日，无为县档案馆：1-1-1-1958-096。

县委书记处书记张云在这次会上说：“听个别群众反映，说不够吃，有个妇女说，20多天未吃。黄龙社只吃十二两。”这是无为县第一次出现有关饥饿的报导。在讲完这句话后，张云可能意识到不妥，赶紧把话题转到反瞒产：“在割早稻时，就发现蜀山有两个小队瞒产”云云，余言不录。

吕奋志要求干部做到：“没有人民来信；吃饱吃好，不外逃；不出事。”所谓“出事”，指的是“闹粮”，即带有暴动性质的群体事件。可见1958年底的粮食状况已经相当严峻。

元月14日，无为县委书记处召开会议，会议的内容是汇报各公社的粮食安排情况。¹⁰姚奎甲未参加会议。书记处书记施惠之对蜀山、襄安等几个区的存粮数和需粮数作了估计，称：

现有各种存粮9391700斤（包括代食品）……按照每人每天15两，可以吃36天（包括代食品，不包括估计的）从元月11号到2月27号，我说最多只能吃15天。这里面包括代食品，如桔梗等。

在这个区域中，粮食“最多只能吃15天”，说明无为县大面积的断粮快要出现了。会议是14号开的，存粮只能吃12天了。施惠之议及县委的对策虽有多条，主要是打捞秋稻，即打净稻杆中的残留稻，动员社会存粮，种子粮交公保管等。还有一条就是：“凡吃四两到六两的，要适当提高。据我们查，一般吃10两多，大多数两餐。”每天吃四两与六两，平均5两，相当于0.3斤。

这是来自县委最高层关于境内饥荒的报告。县委书记处的书记们，本应就此话题深入讨论，提出对策，即如何拨粮。不料，如上引会议一样，吕奋志插话，将话题引向了另外的方向：“坏分子造谣破坏，未河作业区，用刀子在地上刻反动标语：‘共产党亡国’，石涧也有‘打倒毛泽东’等等。”多讲坏消息，会被当作右倾看待的。而斗争是比民生更重要的话题。吕还藉此传递一个信息，他并不准备针对施惠之汇报之严重饥荒进行任何讨论。

书记处书记、县长谢永康继续汇报所管片中的灾情：

东乡十一个公社，其有问题的6个，问题不大的5个，有问题的6个中，陡沟、汤沟问题最大。这两个公社，九个作业区问题更大。沈殿区，282805人，现有粮食

¹⁰《县委会议记录》，1959年元月14日，无为县档案馆：1-1-1959-130。

11540000 斤（不包括代食品），按标准供应，可吃 36 天。区中很不平衡，有的能保 100 多天，高沟能保 103 天，有的只保 2 天。

将谢永康主管之地区的与施惠之主管的地区相比，施惠之主管地区情况要差得多。由此可以推测，无为县已经发生大范围的严重饥荒。同样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书记们竟然没有讨论如何救济只有 2 天口粮的地区。谢永康继续汇报灾情：

陡沟五一作业区从元月 1-11 号，每人每天吃四两多一点。妇女生产，小孩生病都吃不到米，有个产妇只吃 17 斤，营养有问题……□□作业区从 1-8 号……每天每人只吃七钱多。白富作业区有两个食堂，已停伙食四天。

陡沟有些地方已断粮四天了，情况万分危急。然而，书记们仍然没有讨论如何救济灾民。吕奋志发言，谈的是干部与群众大量外逃。如他提到合头公社跑掉 320 多人，其中光明作业区跑掉 200 多人。接着要谈的问题还不是救灾，而是确定口粮标准。

2、十两生命线

在全县断粮的关键时刻，吕奋志在亟需深入讨论的节骨眼上将话题转移。吕说：

根据三个点的回报情况，下面情况基本上摆出来了。现在研究怎么搞。首先研究口粮标准问题，我的意见，每人 490 斤，但这里面教育节约粮食，多找代食品。代食品折粮食怎样折法，统一起来。粮食供应，最低不能低于十两。

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在已经开始断粮的情况下，谈一个不着实际的每人年均 490 斤的高口粮标准，不知用意何在？不过，在这段发言中，吕提出农民口粮每天十两的最低标准。

关于全县范围内的缺粮数，谢永康强调，既使用菜来支撑两个月的话，东乡还需要 4000 万斤供应，至少要 2000 万斤。朱吉祥等人认为只要 700 万斤，并称“我们包下来”，谢批评他们有个人主义。吕奋志则称：“现有粮食能保吃 46 天，到夏季需要 4000 万斤。”谢永康的东乡缺 4000 万斤，吕说全县缺 4000 万斤，两人没有讨论，更没有争辩。

本次会议达成的最后意见是：口粮标准最低不少于十两，最多不超过 14 两米。这是净粮食，不包括代食品。十两标准可以折为 0.625 斤（10/16）。这是成品粮，折算成原粮，每

年人均口粮 304 斤。这个定量不包括代食品，可说是相当务实的。只是与会的书记们没有以此为基础讨论缺粮区有多大，人口有多少，按照这个口粮标准，每个地区该拨多少粮食。

在无为县委会的记录中，可以多次看到最低粮食标准的提法。所有的提法都指向十两，于是，我们称此为“十两生命线”。

在中国传统的膳食结构中，人所需热能的 60%—70%来自糖，糖基本来自谷物中的淀粉。无为县的主要谷物是稻米。每 100 克米含淀粉 75 克，每克淀粉产生热量 4.1 大卡，0.625 斤米即 312.5 克米中含有 234 克淀粉，可产生热量 $234 \times 4.1 = 961$ 大卡。中国成人（18-59 岁）的基础代谢率 BMR 大约为每天 1556 大卡。¹¹其中男性需要 1561 大卡，女性需要 1253 卡，平均值为 1407 卡，据此，961 大卡可以维持一个成年人基本代谢需要的 68.3%。即每天 0.625 斤米可以维持无为县一个普通成年人之基本的生理代谢，亦即满足生存之需求。

1959 年元月 14 日的会议确定了十两标准后，以后的会议理应落实这个标准。元月 17 日，无为县委召开各公社第一书记会议，讨论的主题却不是援助缺粮区或断粮区，而是“动员社会存粮”，即“反瞒产”。

会议是由吕奋志主持的。吕奋志说：“目前发动 4 万多人，预计全县还能打闹秆稻 160 多万斤”；“动员社会存粮，主要是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几十天来，事实证明，哪里的工作搞得越好，干部积极，哪里动员出来的粮食就越多”；“能够自留自，部分有余的作业区，能占 15%，据 26 个作业区调查，这种作业区占 3 个。缺粮 2-3 个月口粮的要占 70%。没有存粮的，以闹秆稻为口粮，打多少，吃多少，有 15%。”

吕奋志的观点很清楚，也很矛盾。70%的作业区缺 2-3 个月的口粮，缺粮是普遍的，15%的作业区有存粮，存粮是少量的。然而，上面没有粮，政府没有粮。缺粮怎么办，只有打稻秆。姚奎甲也参加了会议，并讲话。姚的话不长，但他的心情似乎有点沉重。他说：

生活上是个问题。有的每天只吃几两米，干部思想畏难，向上伸手。由于粮食上
有问题，人民来信很多，还发现反坏分子造谣破坏。从粮食数字上看，摸的情况有问
题，因为数字太具体，弄成绝对的。根据以上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要很好研究一

¹¹中国营养学会编著：《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简要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1 年，第 15 页。

下。从现在情况来看，是问题复杂，情况紧张。

这是姚奎甲第一次承认人民生活面临困难，情况紧张。尽管如此，他还是希望县委领导下乡摸产量，而不是安排生活。摸产量，不要摸成实的数据。到底怎么办，他现在没有底，或者有底而不说。这一发言的关键是，要摸底，但不要将数据弄实，弄实以后就没有弹性了。姚感觉到，形势严峻，他必须为自己留下足够的空间，以争取在粮食问题上的主动权。

本次会议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区及公社干部表态，解决思想问题，争取下乡摸出更多的粮食来。

3、开仓放粮

1959年的元月下旬，无为县在“动员社会存粮”的运动中度过。对于那些已经断粮或即将断粮的地区而言，这半个月可以说是生命攸关的。大约在二月上旬，安徽省委曾庆梅书记和两位省长来县视察工作，重点是农村生活安排和农业生产。二月还是农闲季节，根本没有什么生产可以视察。唯一可以视察的，就只是农村生活安排了。这说明，农民口粮的短缺，已经惊动了省委与省政府的主要领导。

2月11日，姚奎甲在县委委员、区乡党委书记、整社工作小组组长会议上讲话，提到这次会议的召开与省委领导的视察有关。姚宣布，通过“复打复收，清理仓库，动员社会余粮，总共搞出了843万多斤粮食”。这个数字偏低，还要抓紧动员社会存粮，即“反瞒产”。因为，目前农村的缺粮，“同我们的家当碰不起头来”。¹²

“我们的家当”本来是一个1958年11月28日已经“解决”的问题，即1958年全县总产12.4亿斤。然而，在危机时刻，姚并不打算继续采用这个数据。他说：“这里不打算再讲58年粮食总产量和它的支出情况，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问题一时很难搞清。现在只就我们全县今年征购起来的粮食，具体的算一下账给大家听一听。”

姚的账是这样算的：1958年全县实际入库的粮食是35100万斤，加上上年度积存下来的3500万斤粮食，共计是38600万斤。这就是“家当”。将“家当”当作实际入库的粮食，而不纠缠于农民的“社会存粮”，无疑是更为现实的做法。需要再次指出的是，“上年度积存

¹² 《姚奎甲同志在县委委员、区乡党委书记、整社工作组组长会议上的讲话》，《县委会议记录》，1959年2月11日，无为县档案馆：1-1-1-1959-132。

下来的 3500 万斤粮食”完全是姚奎甲编造的。¹³

姚继续算账：38000 万斤粮食，已经支出的：外调 11900 万斤，58 年 7 月到今年元月，城镇供应用掉 7100 万斤，合理损耗 150 万斤，三项合计，总共支出 19150 万斤。目前还要支出：外调 8100 万斤，城镇供应 2000 万斤，种子储备 1000 万斤，合理库存 2000 万斤，合计 13100 万斤。除掉已经支出和即将支出的粮食，现有的实际库存只有 6350 万斤。

无为县城镇 7 个月的用粮为 7100 万斤，平均每个月为 1000 万斤。这一数据与上引资料所称每月城镇用粮 500 多万斤不符。也可能由于大炼钢铁，大量劳动力集中到工业部门，耗费粮食相当多。另外，还要外调 8100 万斤，合计外调 2 亿斤，这个数据与表 1 所载是吻合的。如果以 500 万斤一个月计算，城镇可以供应 4 个月，即可以吃到 5 月中旬，小麦要 6 月初上市，城镇用粮不够。另外，种子大概是指中、晚稻和双季晚，也似乎不够。

城镇到底要用多少粮食？无为全县有 10 万非农人口。以每人每年 490 斤原粮计，四个半月每人需要粮食 184 斤，合计需要原粮 1838 万。如果以每人每年 540 斤原粮计，四个月每人需要粮食 180 斤，合计需要原粮 2025 万。由此可知，县委准备了 2000 万斤城镇用粮是合理的。

据上文，无为县的实际入库只有 35000 万斤，外调及消费之后，余下的库存实为 6750 万斤，其中包括“合理库存”2000 万斤。所谓合理库存包括对种子的补充。如果合理库存只有 1000 万斤，无为县委可以用来救荒的粮食还有 5750 万斤。

安徽省委的指示却是，这些粮食可以供应农村，但要做好工作，争取在现有的基础上多调出、少供应一点。姚奎甲对此深表赞成，并算账如下：

各个公社报来的现有粮食 3000 万斤，县里库存还有 6000 多万斤，加起来约有 1 亿斤。农村只有 85 万人口，从现在安排到五月份，每个人平均还要摊 100 多斤，再加上我们搞社会余粮，找代食品，你们看日子能不能过？再说，把我们 6300 多万斤粮食全部拿出来供应农村，安排到五月底，平均每人 100 斤，也要供应到 63 万人，占农村人口的 75%……可是最近大家报来的粮食安排数字，却要 8000 万到 9000 万斤。

¹³姚奎甲：《我的检讨》，《关于对姚奎甲的错误问题调查报告及处分意见》，无为县档案馆：1-1-1-1963-322。

以 6000 万斤粮食计，85 万农业人口，每人可以分得 70.6 斤稻谷，折合 53 斤大米。仅可供两个月的食用。如果假定农民自己还能凑出 50 斤大米，灾荒的渡过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问题是，无为县农民（公社、大队或食堂）手中还有 6000 万斤的稻谷吗？

我们也来算一笔账：1958 年无为全年收获 6.2 亿斤原粮，减掉入库的 3.5 亿斤，尚存 2.7 亿斤。从 1958 年 7 月至 1959 年元月的 7 个月中，85 万农业人口以每人每年 490 斤原粮计，共需原粮 2.43 亿斤。如此，全县农村仅剩 0.27 亿斤原粮。据表 1，以 200 万亩播种面积计，每亩需种 20 斤，全县需要 4000 万斤种子，而县里只储备了 1000 万斤。还要扣除饲料，无为县乡村已经断粮了。

然而，这个时候的无为县虽然情况紧张，但却没有全面断粮。唯一的理由就是部分农民家中确实存有 1957 年的余粮。排除 1958 年的浮夸不计，1957 年是仅次于 1955 年的大丰收年，部分农民家中藏有余粮是合乎逻辑的。

所以，我们才认为各公社报来的现有粮食 3000 万斤可能是真实的。如果县里能够拨出 5700 万斤原粮，加上公社自己的 3000 万斤，共有原粮 8700 万斤，人均拥有原粮 102 斤。以 110 天计，可以吃到 5 月底小麦登场，每人每天拥有原粮 0.93 斤，折合大米 0.7 斤。必须承认，这是一个可以渡过死亡的口粮数据。尽管无为县的灾情已经非常严重，但还是可以依靠县里的存粮渡过危机。

问题在于，安徽省委的指示却是多调出一点粮食，少供应一点粮食。所以，姚奎甲不得不加紧“动员社会存粮”。要知道，各公社报来的 3000 万斤粮食，本来就是包括“社会存粮”在内的。姚提出的最后的方案是，“先拿出来 5000 万斤，一次安排，剩下的 1000 多万斤粮食，作为后备力量，力争不拿出去。这一次拿出的粮食，要一次分配到公社，一次安排到食堂，一次安排到人，一次安排到五月底。”依照上面的算法，县里只能拿出 5000 万斤粮食，缺口只能指望“社会存粮”了。

从姚奎甲的这次讲话中，我们知道，在各地粮库基本竭尽的背景下，省里加紧了动员社会存粮的动作。姚说，张（凯帆）省长在和县打电话告诉我：“和县搞出了几千万斤社会余粮，你们也要抓紧，不能放松。”姚强调：不准翻箱倒柜，强迫命令。由此可以看出，1959 年春天的“反瞒产”，其目的是为搜刮出农村的现在存粮，来救济其他缺粮者，而不是将农

村的所谓“存粮”调入国家粮库。

四、大饥荒：1959 年夏至 1960 年初

1、非小麦区的人口死亡

直到 1959 年 3 月 3 日，县委会讨论的主题仍然是“反瞒产”。为节约篇幅，此不赘言。由于得到县里下拨的 5000 万斤粮食，按照上文计算，社员口粮可以支撑到 5 月底小麦登场。按理说，小麦登场以后，危机化解，饥荒结束。

1958 年无为县冬小麦播种面积为 163.6 万亩，1959 年夏，小麦成熟，总产量为 3373.6 万斤，亩产 130 斤。加上黄豆等项，夏收总产 4771.6 万斤。¹⁴依上文标准，至少可以满足农民 60 天的口粮，直到 8 月上旬中稻登场。然而，这是一个没有考虑征购及外调粮食的算法。征购及外调，有可能使上述算法陷于土崩瓦解。

小麦一登场，征购就开始了。6 月 11 日，姚奎甲在公社书记电话会议上宣布，夏粮的征购任务是 5000 万斤¹⁵，居然超过了夏粮的全部产量。

在 6 月 25 日召开的县委常委会议上，姚奎甲说：“入库粮食 2100 万斤不到，占任务 41.7%。我的思想打八折完成，4000 万斤。”谢永康说：“最低限制，不购上来 2500 万斤，日子是不好过的。外调 1000 万斤，地委未同意。姚政委说，不购 3000 万斤，日子是不好过。还有 900 万斤，一定要购起来，当然有重点收购。”¹⁶

已经征购上来的粮食不足 2100 万斤。无为县委同意外调 1000 万斤，但芜湖地委认为太少，没有同意。在谢永康那里，征购任务从 5000 万斤退守至 2500 万斤，但在 6 月 26 日继续召开的常委会上，姚奎甲还在坚持 3000 万斤的征购量，并将继续征购 900 万斤作为死任务，分配给有关各公社。

徐干的发言记录可能是不完整的。他表态拥护姚奎甲的 900 万斤任务，并谈到一些具体的措施，此不转引。然而，姚奎甲对其发言的反应颇值得玩味：

老徐提说吃十两，这话不能讲，可以这样讲，富日子要从穷日子打算，宽日子要

¹⁴无为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无为县志》，1993 年，第 131 页。

¹⁵《县委会议纪录》，无为县档案馆：1-1-1-1959-140。

¹⁶《县委会议纪录》，无为县档案馆：1-1-1-1959-140。

作紧日子打算。如果在姚沟、高沟提出这样话，会制造紧张，对完成任务起促退作用。

会议记录中，徐干的发言记录中，没有关于“十两”的内容，当为漏记所致。姚沟、高沟属于泥汭区，位于长江北岸，也属于东乡的范围。是小麦产区。姚的意见是，如果在小麦产区提出十两，“会制造紧张”。这意味着东乡原来吃得更少，达不到十两标准。如果达标，小麦产区留粮更多，政府感到紧张。

夏粮总产 4771.6 万斤，1000 万斤外调，余 3771.6 万斤，40 万亩留种，每亩 20 斤，则需种子 800 万斤，余 2971.6 万斤。85 万农民人均可分得 35 斤原粮，80%折粮，可得成品粮 28 斤。在无为县，7 月中旬早稻登场，所以，以 45 天计算，每人日均 0.62 斤。由此可见，徐干说吃十两，是有道理的。无为县委的干部们坚守十两的生命底线，抵制外调数量的增加。

在无为县，小麦主要产自东乡圩区，西乡浅丘地带，一直没有种植小麦的习惯，既使在粮食紧张的 1958 年，也是如此。无为县非小麦种植区农民口粮，要靠政府调剂。就在这次会议上，县委作出了向西部非小麦产区发放 200-300 万斤粮食的安排。只不过，这 200 万-300 万斤粮食并不出自县粮库，姚说：“我的意见，购起来 2000 万斤，不动，现在把几个重点抓起来，把全县口起来。”这 200-300 万斤的指标，还是要出在东部农民的口中，从东部取出，支给西部非小麦产区。

由于缺乏数据，我们不知道无为非小麦产区的范围及人口，也无法估算这些粮食是否能
让农民支持到水稻收割。姚说：“现在一般按一斤原粮供应，象仓头、宗法、刘渡也可以少
吃，因为他们种少了。”¹⁷这是不给小麦少产区供应粮食的理由。情况肯定是严重的，姚说：
“农民外流，人民来信，浮肿病复发，这是夏荒的象征。这要充分估计到，但也不要被这个
象征所吓倒。”革命乐观主义是战胜困难的法宝。

2、张凯帆下乡

由于区域粮食生产与供应的不平衡，无为县西部非小麦产区的粮食问题就变得特别的紧张。政府的救济粮，只安排到 5 月底，整个 6 月份，非小麦产区可能陷入空前的断粮危机。石涧公社，就是其中的典型。

¹⁷仓头属于石涧区，宗法又名六店，属于开城区，刘渡属于襄安区，皆处西部丘陵地区。

石涧位于无为县的中北部，属低岗丘陵区，不产小麦。5月底断粮后，人口大量死亡。公社书记谭布真向省委反映死人情况。实际上，在上引6月25日的县委常委会上，姚奎甲说：“石涧谭布真同志，对一些实际问题，就不解决，这次我们下决心，一次把他解决。”关于石涧死人及谭布真的活动，姚奎甲已有耳闻。

7月4日，省委书记处书记张凯帆来到无为调查。7月7日，张凯帆在无为县五级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在张讲话中，通篇没有出现“死亡”一词，将《无为县志》所载张之讲话记录与县委记录中的张之讲话记录比对，文字略有差异，也没有“死亡”一词。张凯帆说：

这次，我从石涧那边来，昨天又到襄安、泉塘、蜀山一带看了一下。我见到现在病人很多，特别是浮肿病很多，粗腿很多，妇女子宫下垂很多，闭经的很多。我们到了许多村子都看到床上睡着病人，每个村子都有，病人为什么这么多？¹⁸

几乎所有的领导人都在刻意回避“死亡”一词。这成为大饥荒政治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其中原委，下文还有分析。张凯帆在无为西部看到的群众口粮状况是怎么样的呢？他说：

我前天经过石涧，路上停了一下，很多群众围上来向我诉苦说：“现在我们的生活还不如鸡，鸡每天还有两把米，我们每天只有两把稻子。”……现在农民吃什么东西？口粮标准多少？你们安排了多少？县里讲一斤原粮，其实一家老小，平均不过二两¹⁹。我们有些同志胆大妄为，乱改标准，置群众生死于不顾，还有一点人性吗？

一天二两的口粮标准，只达维持生命十两标准的五分之一，已经接近于断粮。人口死亡的状况应该相当严重。迄今为止，我们既没有查到谭布真给张凯帆的报告，也没有查到张凯帆给省委的报告。但在《张凯帆回忆录》中，张讲到他在石涧沿河梢村，见到“全村十几户人家就有九个孤儿”，以及人口死亡的具体惨状。²⁰可见，张是亲眼目睹百姓之死亡的。在群众大会的演讲中，张凯帆从语言上回避了“死亡”。

张凯帆与省委采取的措施是开仓放粮，保证农民每天口粮为1斤原粮，并承诺早稻收上

¹⁸ 无为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无为县志》，第599-603页。

¹⁹ 《无为县志》编者注明此为16两制。

²⁰ 张凯帆：《张凯帆回忆录》，第346页。

来以后，将农民每月口粮提高到 40 斤原粮以上。7 月 10 日，姚奎甲在公社书记电话会议上讲话，告知粮食已经发放，“情况有所好转，群众满意。一是增加标准满意，二是分到户满意，三是自己到粮站购粮满意”。²¹

3、大饥荒

1959 年 7 月 10 日之后，无为县委的会议记录可供讨论的内容不多，故略而不论。大约从 7 月 15 日开始，无为县农村进入紧张的农忙季节，收割早稻，栽插晚稻。无为县以前没有种植早稻的习惯，1953 年农业改制，无为开始大面积种植早稻及双季晚稻。不过，1959 年的早稻种植并不顺利，《无为县志》的记载是这样的：

1959 年春，要求全县提前半个月，即提前在清明前 3 天播种，一下子损失早稻种子 8 万斤，幸存的少量秧苗，又要求提前栽插，因苗短气温低，栽下的 20 万亩秧苗几乎冻死殆尽。²²

以每亩种子 15 斤计，8 万斤种子只不过是 5300 亩早稻田的用种量。幸存的少量秧苗，是不可能栽插 20 万亩秧苗的。如果这 20 万亩秧苗冻死或几乎冻死以后重插，涉及到育苗环节所需时间过长，节气上就来不及了。待育好秧后再插，就不是早稻，而是中稻了。由此可知新修县志对于 1959 年的批评，也存在夸大的地方。

在《无为县志》农业统计数据中，1959 年早稻种植面积为 45 万亩，亩产 250 斤，较之 1954 年的 400 斤和 1955 年的 500 斤，少了许多，双季晚稻种植面积为 20 万亩，这令我们相信，早稻面积一定不会少于 20 万亩。如果全县只栽种了“几乎冻死殆尽”的 20 万亩早稻，且早稻总产又是可信的，那么，其亩产就不是 250 斤，而是 625 斤。到底是 1959 年的早稻面积有假，还是产量有假，还不能确定。依《无为县志·大事记》，1963 年中共无为县监委认定的 1959 年无为县粮食总产为 4.4 亿斤，而《无为县志》农业统计为 4.48 亿斤，说明《无为县志》农业统计中记载的 1959 年早稻栽插面积是正确的。

1959 年无为县中稻面积只有 40 万亩，较 1958 年要少 33 万亩，且中稻亩产只有 300 斤，较 1958 年减少 168 斤。仅中稻一项，产量就减少 2.22 亿斤。这一减少的数额大大超过 1958

²¹ 《县委会议记录》，无为县档案馆：1-1-1-1959-140。

²² 无为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无为县志》，第 126-127 页。

年与 1959 年无为县粮食总产量的差额。也就是说，1959 年的减产，主要是中稻面积的减少及已种中稻的减产造成的。中稻面积的减少与早稻面积的扩大有关，而中稻亩产的减少则与中稻的田间管理有关。中稻田间管理的疏忽，除了与反瞒产及上半年的饥荒有关外，还可能与小麦登场后的高征购有关。在 1960 年 1 月 15 日常委会议上，吕奋志说：“我同姚政委讲过，完成这个任务，损失 4000 万不只（止）。”²³如上文述，不足 4000 万斤小麦的总产，征购任务高达 4000 万斤，当然是一个完不成的任务。而县委的催逼讨要，有可能导致田间管理环节的全面崩溃。

9 月中旬，秋粮收获，新的征购也就随之展开。据 9 月 14 日施惠之在公社党委书记电话会议上的讲话，全年征购任务定为 2.5 亿斤。

1959 年秋收作物总产 4 亿斤，实际外调 1.61 亿斤。²⁴全县实际可支配粮食为 2.39 亿斤。其中城镇供应 0.6 亿斤，秋收种子以 160 万亩计，每亩 15 斤，需要 0.24 亿斤，合计需要 0.84 亿斤。余 1.55 亿（2.39-0.6-0.24），就是农民的口粮了。

假定因为死亡与逃亡，此时无为县 85 万农民只剩 80 万，人均口粮 194 斤，折合成品粮 145 斤。以十个半月 315 天计，每天人均口粮 0.46 斤，没有达到 0.625 斤这一维持生命的基本水平。1959 年下半年至 1960 年的大饥荒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依此思路看一看 1960 年秋天的农民口粮。1960 年全县实际总产只有 4 亿斤，外调粮 1.12 亿斤，余 2.88 亿，其中城镇与种子粮合计需要 1 亿，农民口粮为 1.88 亿斤。据表 1，1960 年无为全县只剩 66 万人，其中农民 56 万，农民每人年均口粮 336 斤，折成品粮 252 斤，每人日均 0.69 斤，达到不饿死人的水平。考虑到 66 万人口是 1960 年底的数据，1960 年初的人口还要多一些，人均口粮水平事实上还要低一些，无论如何，夏粮收获之后，无为县人均口粮超越死亡线是没有问题的。

总之，无为县悲剧的结束本身也是悲剧性的，它不是因为粮食产量的增加，分配的更加合理而结束饥荒，而是因为人口大量死亡之后，粮食总消费量减少，活下来的人得以继续存

²³ 《县委会议记录》，无为县档案馆：1-1-1-1960-195。

²⁴ 其中本应扣除外调小麦 1000 万斤，但 7 月 7 日会议之后，政府开仓放粮 2000 万斤粮食救济农民，所以，1959 年无为县没有外调小麦。如此，秋收作物需要外调 1.61 亿斤。关于政府开仓放粮事，见 1961 年 1 月 14 日姚奎甲在无为县委常委会议上的检查记录稿（《县委会议记录》，无为县档案馆：1-1-1-1961-247）

活。

五、县委会：不敢面对的死亡

1、谁在说“死亡”

从今天掌握的情况看，1959年春天，大饥荒在无为县蔓延。然而，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县委会的会议记录中，都没有相关的记载。最早的记录出现在1959年3月3日的县委扩大会议上，这次会议的重点是学习曾希圣二月廿二日在电话会议上关于粮食工作的讲话。姚奎甲要求与会者“联系自己思想发表个人意见，对农村粮食的看法。”²⁵

每个公社负责人汇报情况，或谈自己的认识。如宗发公社是这样报告的：

最近宝山说70多人生病，高王126人生病，大部分是中农以上的，而且是男人。

经了解大部分是假的，主要对粮食等工作未搞好。

少数群众公开说粮食被政府搞走了，现在没得吃。□□□□友说：“偷东西有什么关系，三个月以后就是我们天下了。”到处偷窃。曹德义（富裕中农）有破坏活动，偷社里的稻吃了以后，还说办食堂把人办得饿死了，偷房料、农具烧火……

这可能是县委会议记录中第一次出现“饿死”人的记载。有意思的是，这一记载是采用负面表达的方式：是一个富裕中农说的。富裕中农，在那个时代，虽然与地主、富农有区别，但以路线划分，却是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不仅如此，宗发公社的负责人还说：

最近偷油菜吃的很多，白天夜里都搞。小队干部中农成份占优势。蒋升平骂人，打人很严重，干部吃酒很多。最近发水肿，可能是食七（菜）过多。

看似相当随意的一句话，披露缺粮导致水肿病，却始终不肯说出“死亡”来。而且，这种事情，也有政治上的原因，即是中农出身的小队干部所为。随后，神塘、新河、高沟公社负责人的报告，与此大抵相同。只有响山公社负责人说：“再看群众的身体来看，是健康，不是面黄肌瘦。”在无为县，只有响山公社实行过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的“大食堂”，也只有

²⁵ 《县委会议记录》，无为县档案馆：1-1-1-1959-138。

响山公社负责人受到毛泽东的表扬。关于响山公社的共产主义，可见《人民日报》的相关报导与通讯。²⁶

负责湖陇公社的“吴行长”——估计是县人民银行的行长——不知有意无意，大胆而明确地说：“死人了”。

生产一般都动起来了，仅宏巷作业区未搞起来。主要是个个村子有人生病。去年11月份到现在死掉21个，大部分是50岁以上的人。经医生检查，还不出交待。病人能吃，又不发热。我们认为是偷懒。妇女、孩子都没有病，又有男人生病。有个村子89人，就病了67人。

尽管吴行长认为病人无病，是偷懒，但毕竟在县委会的会议上，说出了21人死亡之事实。且依吴行长的发言，湖陇的死亡，是从1958年11月份开始的。

上文已述，1959年春天的饥荒，由于省委书记及省长带队视察，以及开仓放粮，灾情得以缓解。六月间，粮食用尽，新粮不济，尤其在无为县的西北部非小麦产区，灾情更为严重。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大量出现。在上文引述过的1959年6月25日至6月26日召开的县委常委会议上，“死亡”一词再次出现。周处长说：

浮肿病问题。高鼓大队72个，有9个未好，死亡六个。据反映，九和冲300多人，死掉70多人（从春上到现在），有一户8人，死掉七个。这个问题，只听反映，没有到村上去。我估计，即未死掉70个，什么二、三十人还是有的。最近死掉18个。不管怎样，死亡现象很严重，至于死的原因，是另外的事情。请县委派人去检查清楚。

现在还不能确认，这里所谓的“周处长”，是不是县委书记处书记且兼任县长的周永康。周虽然不敢直言死亡的原因是饥饿，但承认死亡是最重要的。从这点看，县委委员们对于人口死亡现象是知情的。

这天的县委常委会议，并未对周处长汇报之重大死亡现象作出任何回应。会议在讨论各地供应指标这一话题中结束。如果县委常委会议真的讨论供应指标，就可以作这样的理解，

²⁶无为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无为县志·大事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6页。

县委以粮食供应来解救死亡。然而，从7月7日张凯帆在无为县的讲话来看，6月26日之后，无为县委并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动作。

7月7日，张凯帆在无为县五级干部会议上讲话，未有一字涉及死亡。7月10日，姚奎甲在公社书记电话会议上讲话，公开承认死人。但讲的只是五老力山吴生产队，死了17人。7月20日，地委电话会议，地委耿政委谈疾病、农业生产和生活问题。其中提到无为的有这么两段：

无为西乡几个公社的部分大队生产队比较严重的浮肿病、肺病、血丝虫病，最普遍的是肠胃病。对浮肿病统计有重复现象，有的已治好，又统计。有的想吃大米红糖，把别的病也报浮肿病，襄安大队把多年的粗腿也报成浮肿病，像这种情况不少，扩大了浮肿病人数。

对病人了解要结合生产进行。通过搞好生产来了解病情，在统计病情时要具体，要有姓名，年龄，成分，什么病，发病时间，原因，好的时间，复返的时间绝不能重复统计，绝不能把社会正常死亡和非正常死亡混合起来，如果一时搞不清楚，可逐步了解。²⁷

这时庐山会议精神还没有下达。芜湖地委耿书记是按照他自己对于疾病的理解下达指示，可能与正在召开的庐山会议无关。当然，也存在一种可能，即通过与会者的消息外流，庐山会议精神已为一批党内高级干部所知。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就是庐山会议的参加者。

2、施惠之与张英的检讨

1959年9月24日，姚奎甲主持了无为县常委会，会议的主题是反右倾。这时，安徽省委揭发了张凯帆、陆学斌的“反党联盟”，施惠之被认为是张凯帆在无为的反党联盟成员，被责令检查。施惠之在检查中这样说：

病情问题。我当时有右倾情绪。在石涧问题发生以后，我在宗发摸了一个重点队，病情严重。我感到惊慌。在食堂解散以后，积极主张解决社员回家起伏用具，但对病

²⁷ 《县委会议记录》，无为县档案馆：1-1-1-1959-140。

情未作正确的分析。后在宝胜了解，妇女病只有一人，口锋只有五个。开始了解的两个包产队有问题，后看了几个队，就不是那样情况，加上与耿政委，丁书记等碰了一下头，思想才较稳定。第一次向姚政委汇报，说病情严重，我们县委是要负责，当时对宗发公社的看法是：病人多，劳、牛力少，反过来看，宗发生产还觉得很好。

施惠之是县委书记处第三书记，派到宗发公社蹲点领导。在宗发，他看见了大规模的人口死亡。于是，他感到惊慌。这里说的情况，应该是1959年初夏的情形，那时，石涧死人事件已经发生。施向姚报告，并称县委要对死人一事负责。而在九月的检讨中，他说他在与地委书记们交流情况后，思想才稳定。我不知地委耿书记他们对他说了些什么，综合其他资料看，耿书记可能教施书记要看全局，死人的事情是局部的，是个别现象，施书记的情绪于是“稳定”了下来。

就在这次会议上，谢书记也参与了揭发，可以看出施惠之确实是恐慌至极。谢说：

施惠之同志当时到宗发以后，表现惊慌失措，对宗发面的情况未正确分析。当时把问题看得过重，叫我去宗发，意思是想共同处理宗发问题。

姚奎甲发言，他在批评施惠之“怕负责任，惊慌失措”后，又说：

在宗发只看点滴东西，不分析全面情况，认为情况严重，叫谢书记去，这是不应该的。按书记来讲，你老施是第三把手，你来无为比人家又早，一个公社是否需要几个书记去……在宗发回来后，向张汇报时，是免不了要反映一些落后东西。

情况很清楚，施惠之在宗发公社看见了大规模的人口死亡，他感到惊恐。怕负责任，要求谢书记与他共同主持宗发公社的工作，为谢书记拒绝。张凯帆来到无为后，施向张汇报了宗发公社的死人情况。施惠之因此而犯下右倾错误。

在面对死亡时，卫生科长张英也表现出同样的惊慌。在1959年10月所作一份检查中，他说：

在二、三月间，开城汇报他们发生浮肿病情况……而开城来的电话又接到谭主任那里去了。以后谭主任问我开城发生浮肿病怎么搞的，你们在家里搞的什么？死了这

么多人，你们都不关心，怎么向县委交待，出了问题，就是书记撤职，你们也要杀头。

当时我对这情况害怕起来。²⁸

请读者注意，这是 1959 年 10 月的检讨，检讨的是右倾，而不是其他。开城公社属于无为西部丘陵区，人口死亡较多。然而，由于是检查右倾，所以张英才会说：

因此我在医院抽出两名医生，连续去新民、凤河、东河三个大队调查，根据我们调查，大队所报的病人，大部分不属浮肿病，如新民大队的小庄所报 14 人中，仅有一人是浮肿病，凤河、东河的情况亦相仿。

由于怕犯右倾的错误，张英否定浮肿病人的存在。可是，这样的做法是有很大的风险，因为他是医生，是卫生科长。张英将调查所得向县委汇报，又向县委宣传部的邵部长进行口头汇报，邵部长不同意他对浮肿病人的看法。

五月三十一日朱荣跃在蜀山打电话向我回报蜀山情况，说蜀山计有病人 2236 人，最严重的是十连大队，发病人数占总人口 22.95%。以后我又叫来朱把此情况直接向邵部长回报，免得我周转有差错。朱回报后，邵部长说朱的材料能说明问题，有价值。以后邵部长又叫朱到石涧去……在六月下旬时，陡沟回报有复发现象，接着大概在六月二十六、七的，邵部长说接到宗发孙书记电话，说那里病情严重，而且还死人（数字记不清）。

张英差不多将责任成功地转移至邵部长，又由于有朱的介入，他自己的责任被撇清。在接下来的检讨中，邵部长的处境似乎越来越不利。文字太长，兹不转述。总之，因人口大量死亡而产生恐惧，因恐惧而产生自保，因自保而需要其他人来承担责任。这就是大饥荒时期县级政治生态的表现之一。

3、姚奎甲的“坚强”

1959 年年底，无为县的大饥荒已经相当严重。12 月 27 日，姚奎甲主持县委书记处书记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姚又提及死人问题：

²⁸ 《卫生科长张英的检讨》，无为县档案馆：1-1-1-1959-165。

据看，有荒政象征。1、外流有 600 多人；2、人民来信；3、少数地方，出现疾病，关河有病疫，蜀山公社；4、有弃婴；5、发现个别死在外面；6、公然偷窃现象；7、极少数地方，杀害牲畜。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并未慌张，还在积极采取措施。

29

请注意“个别死在外面”一句，是个别而不是全面；请注意“我们并未慌张”一句，革命的乐观主义可以战胜一切困难。第二天，县委主要负责人与粮食局郑局长在县委小楼召开会议，讨论粮食问题。与会者有谢政委、吕政委、姚政委、省委白部长，粮食局郑局长。姚奎甲认为当前的形势严峻。其一，一部分地区无粮食，生活安排不下；其二，这样拖下去不仅影响生产，且会出现其他问题；其三，目前县里（有灾）荒象征，虽不普遍，也有不少；其四，（无纪录）；其五，死人；其六，杀死人；其七，生病。姚说：“以上七问题，也是灾荒的像征”；“根据上面情况，我们意见：白部长回去向省委反映”。³⁰我相信这次会议上讨论了县境内大规模死人的问题，只是会议记录没有相应的记录。不仅如此，姚奎甲还提出了县境内发生的人吃人的问题，会议记录员也没有真实记录，而是用“杀死人”代之。至于县委是否形成文件向省委汇报，我的看法也是否定的。

按照 1963 年姚奎甲写的《我的检查》，1959 年底，有人向他汇报过县境内的人吃人事件。姚是这样回忆的：

五九年冬姚沟公社书记王代好反映群众非正常死亡，我说不是你打死的，不是你逼死的，他死怪哪个，哪里不死人……我十二月二十九去关河公社。当晚听公社书记徐明礼回报说，全社除双泉大队（圩区）还能搞点粮食以外，其余大队社员生活都有问题。县委给 15 万斤粮食包双泉大队，公社书记要 4000 斤去了，我当时批评徐明礼，不把 4000 斤粮食收回来，你就是瞒产头子，并说今后要粮食一粒没有。实际上双泉大队也无粮，结果使这个大队人口非正常死亡极为严重……县委政法部长邱福田五九年十二月在蜀山公社向我汇报发现两个特殊案件，我骂邱是糊涂部长，哪有人吃人的道理。畜牧场党支书任静轩回报路旁倒死人，我骂人混蛋，死几个人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²⁹ 《县委会议记录》，无为县档案馆：1-1-1-1959-141。

³⁰ 《县委会议记录》，无为县档案馆：1-1-1-1959-141。

我自己坐车也看见过死人倒在路旁，也不闻不问驰车而过，有时仅打个电话告诉公社一下。³¹

作为无为县的最高领导人，姚奎甲与他的同事们完全明白县境内发生的一切。姚不仅听过下属的汇报，也亲眼见过路边的死尸。从内心来讲，他从来就不怀疑县境内的死亡是真实的。然而，姚是一个坚强的共产党人，具备极强的党性，因此，他在面对辖境内的农民大死亡时仍能表现出少有的“坚强”。

六、讨论

在上文中，我们讨论了 1958-1960 年无为县的粮食产量、农民口粮、征购量和外调量，呈现出无为县委在面对粮食短缺、断粮、人口死亡等事件时的种种政治取向和政治行为。可以确认，无为县委对于本县粮食产量及其分配，是知情的。县委用于判断县情，制定政策的基本数据，是真实的。浮夸只是用来糊弄上级的。不仅如此，本文还证明，对于大饥荒时代的人口死亡，无为县委也是知情的。他们不但接到来自基层的报告，还多次亲眼目睹过死亡。他们有时也在县委会的会议上汇报所知人口死亡之事，有时也为无法安排农民口粮而苦恼。他们对于高额征粮以及“反瞒产”的后果，心知肚明。对于自己行为所产生的后果，完全是清楚的。然而，就是在完全知情的前提下，悲剧发生了。

尽管我们还没有发现一份无为县委给上级的灾荒报告，尤其是关于境内人口大量死亡的报告，但我们却不能说芜湖地委与安徽省委是不知情的。上引芜湖地委耿书记对于浮肿病的曲解，可以证明他是知情的。另外，我们有证据证明，无为县的干部们向省委主要领导汇报过县境内发生的一切。1959 年 7 月张凯帆的无为调查，省卫生厅派出医生下乡，就是省委挽救人口大量死亡的重要步骤。对于 1959 年年底及 1960 年年初的死亡，地委与省委不可能不知情。于是，“知情的政治”便成为本文对于大饥荒时期县级政治特征的概括之一。

姚奎甲与他的部分同事，面对县境内人口的大规模死亡，不但不有效地施于援手，反而通过“反瞒产”抢夺农民的口粮——尽管名义上是抢夺一部分农民的口粮，去救济另一部

³¹ 《关于对姚奎甲的错误问题调查报告及处分意见》，无为县档案馆：1-1-1-1963-322。在这份卷宗中，有许多材料，包括姚奎甲自己的检讨，也显示出他有许许多多次看见过人口的死亡，甚至是大量的死亡。

分农民，由此而造成县境内更大规模的人口死亡。灾后，安徽省委以对姚奎甲的行政处分代替了对其刑事责任的追究。在这种模式下，肇事者的过失被认定为“犯错误”而不是“犯罪”。尽管是“犯错误”，但本文的分析却证明，在大饥荒发生的关键时刻，面对辖境内人口的大量死亡，无为县委的许多成员，甚至包括姚奎甲本人，一度也表现出惊恐与害怕。由此揣测，他们对于事件的性质，有着与事后上级处理案情时完全不同的看法。惊恐与害怕，来源于他们内心深处的罪恶感。

所以，不仅无为县委的领导们回避死亡，省委领导包括张凯帆在内也回避死亡。涉事者通常以浮肿病例作为饥荒之指代，以少量的案例来回避大的死亡规模，以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来推卸责任或进行自我安慰。究其原因，大规模的人口死亡，已经构成对于权力合法性的严重挑战。涉事者的刻意回避以及事后上级以“犯错误”作为定性，则可以消解这一挑战。于是，我们将“回避的政治”作为本文对于大饥荒时期县级政治特征的概括之二。

在 1958 年 11 月 28 日无为县委关于粮食产量会议上，我们目睹了县委委员通过协商方式确定 1958 年全县粮食产量的过程。这一案例，可以看作无为县委党内民主的典范，尽管协商所得数据是假的，且较真实产量多出一倍。再以后，我们没有见过县委会议通过民主程序形成过任何决议或意见。如果将投票决策作为党内民主的必需形式，那么，即便在 1958 年 11 月 28 日这个充满民主精神的粮食产量协商会议上，也没有进行投票表决。严格地说，无为县委内根本就不存在程序化的党内民主。

在 1958-1960 年，无为县委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贯彻”或“落实”上级指示。中共无为县委的上级是中共芜湖地委与中共安徽省委，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中下级服从上级的规定，无为县委必须不折不扣地“贯彻”与“落实”芜湖地委与安徽省委的指示精神。下级政权成为上级政权之派出机构。这就是当时中国县级政权所处之政治生态。于是，“服从的政治”便成为本文对于大饥荒时期县级政治特征的概括之三。

总之，1958-1960 年无为县级政治所具有的知情-回避-服从的特征，可以作为同一时期经历过饥荒的县级政治的一般性解释。各地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的原因，或许隐含其中。